

欠发达地区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与振兴对策

——以湘西州凤凰县为例

曾灿¹ 李伯华² 李翠菲² 雷向一³ 窦银娣²¹

(1.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2. 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3.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作为统筹县域(市域)范围内村庄规划的前提与基础, 对后续村庄发展与振兴有着重要影响, 欠发达地区村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 为更好地巩固扶贫成果, 尤为需要科学把握村庄发展类型。文章通过构建村庄发展类型识别模型, 以湘西地区凤凰县为例, 对 261 个村庄进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 (1) 村庄类型分为五类八型; (2) 凤凰县以集聚提升类与基础整治类村庄为主; (3) 凤凰县全域以低发展潜力低限制、中等发展潜力低限制型村庄为主, 整体发展潜力较低导致集聚提升类村庄呈片状分布在国道、省道等交通干道附近。针对凤凰县不同村庄发展类型, 结合湘西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和村庄发展现状, 提出各类村庄相应的规划重点和振兴措施, 精准推动村庄发展和村庄规划转型, 以期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村庄分类 类型识别 发展潜力评价 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 村庄规划 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1) 12-0167-10

乡村是农耕文明的载体, 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1],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差距明显, 农业和乡村的价值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从根本上调整城乡关系, 解决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城乡地域、产业、就业、社会等发生了显著变化^[3], 科学识别村庄发展类型、充分了解村庄发展潜力及限制条件, 进而明确各类村庄的规划与具体措施, 有利于跳脱出传统乡镇为单元的村庄布局规划思维, 从县域层面统筹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4,5]。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复杂多样, 从社会经济来看, 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等, 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尤为突出, 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特征明显, 该地区的农村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6]。乡村振兴并不是对现存所有村庄振兴, 而是有的放矢进行扶持发展, 根据不同村庄的主导类型和限制因素进行分类施策, 将有限的财力、物力资源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才能更具有针对性地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7]。因

作者简介: 曾灿 (1987-), 女, 湖南沅江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为传统村镇保护与规划。E-mail:286197762@qq.com; 李伯华 (1979-), 男, 湖北黄冈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居环境学。E-mail:libeny_2058@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2171215、42071195);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1JJ3006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YBA052、18JD07);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 (20B085);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 (XSP21ZDA003)

此，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类型识别有利于准确定位村庄发展方向，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所在。

国外对乡村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起步较早，如美国的“新城镇建设”、日本的“农村振兴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等，主要集中在乡村发展的主体、理论、要素等方面^[8,9,10]。乡村振兴，规划先行，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认识、具体实施路径、关键点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与讨论^[11,12]。村庄分类是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基础工作，学术界对村庄类型划分做了相关探究，在识别体系方面：有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四方面分级分类识别，划分出 5 种主导类型^[13]；也有按“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并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14]；还有通过建立村庄分类模型，从村庄特色、村民生存、发展建设、城村联系、村庄功能五个维度进行村庄类型识别^[15]。在国家明确村庄划分类型之前，有通过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结果和地缘特征划分村庄类型^[16]；也有从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结果叠加三类空间（生态、农业、城镇）划分^[17]，还有从规划建设^[18]、经济发展水平^[19]等方面进行村庄分类。在研究地域方面：从区域的角度（苏北^[20]、苏中^[21]、西北^[13]）探讨乡村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从农牧交错带^[22]、都市近郊区^[23]等特殊地域空间识别村庄发展类型，助力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规划。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综合指数法^[24]、力学平衡法^[25]、地理加权回归^[26]、K-均值聚类法^[27]等。在实践层面：地方政府就村庄分类开展了较多工作，湖南、江苏、广东、福建等部分省级政府出台了有关村庄分类与布局的指导意见，济南、云阳、广州等部分市县级政府已按照现有标准对其县域内的村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索。

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为村庄发展类型划分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村庄规划编制与建设提供了指引。但仍存在不足，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如何进行村庄分类，缺乏较为明确的说明或标准；已有的分类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及最新文件的要求不尽一致。大多数研究均是以某一地区为案例，我国农村千差万别，极为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村庄发展起点不一样，不能采用统一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基于此，本文根据国家有关规划、文件要求，结合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和分类方案，并以湖南欠发达地区的凤凰县为例进行村庄发展类型识别并提出相应规划对策，助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湖南欠发达地区村庄精准脱贫与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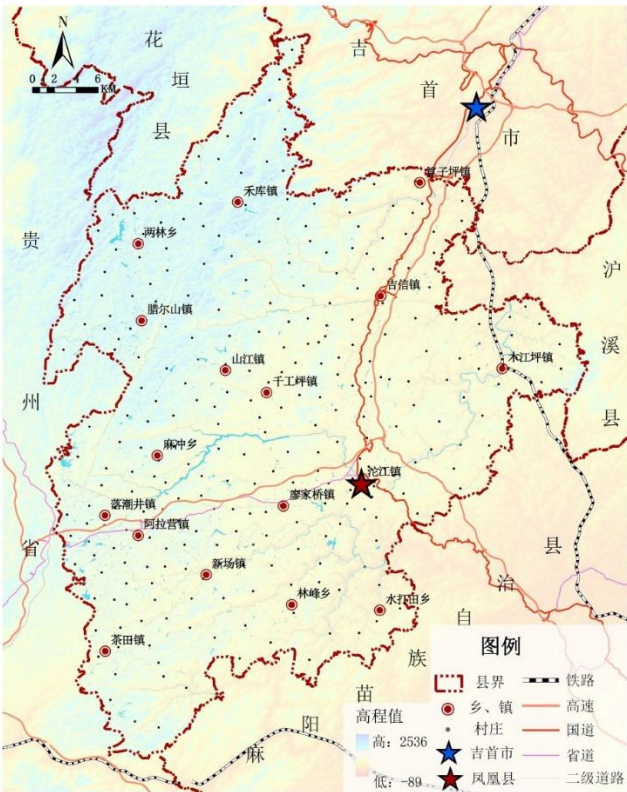


图 1 调研点区位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湘西地区是典型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地区，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省开发重点地区和扶贫攻坚主战场。凤凰县位于湘西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县，下辖 13 个镇、4 个乡，261 个行政村，20 个社区（图 1），其中社区因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不在村庄类型识别范围内。近年来，借助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的政策与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制定出台了《凤凰县 2018 年乡村旅游脱贫工程实施方案》《凤凰县乡村旅游脱贫扶持奖励办法》，做好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工作，使部分村庄实现了脱贫，凤凰县作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其村庄类型进行科学把脉，有利于精准治理与规划，缓解区域贫困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收集了凤凰县遥感影像图，2019 年湖南省路网数据，2019 年凤凰县双评价、生态保护红线、现状建设用地、模拟城镇开发边界等矢量数据；凤凰县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村庄名录等文字数据；凤凰县各村 2019 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数据。其中矢量数据、文字数据均由凤凰县自然资源局规划信息中心提供，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 2019 年各村庄实地调查数据。在本文的村庄发展类型初判因子与修正因子中，社会经济数据主要包括人口规模 J2（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经济发展水平 J3（村民人均年收入）、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 J5（主要公共设施）。J2、J3、J5 数据获取分两种情况进行，对调研时已编村庄规划的 97 个村庄或正在编制的 139 个村庄，根据乡镇提供的规划成果或通过乡镇对接相关编制单位获得；对于暂未开始编制规划的 25 个村庄，人口规模 J2（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 J5（主要公共设施）通过村支两委访谈与实地考察获取，经济发展水平 J3（村民人均年收入）结合村支两委访谈与问卷分析综合获得，其中，问卷数量分别以每村户籍人口 30% 发放，户籍人口 30% 的问卷发放量是湖南省村庄规划编制中村民调研问卷发放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 J3 只是村庄调研问卷中的一项指标，村民人均年收入 J3 以每村有效问卷中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累积相加/每村有效问卷数获得。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借助 Arc-GIS10.5 软件，对各类数据进行空间展示，并利用其空间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点距离分析等功能分析交通距离、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等内容。

2 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体系

2.1 村庄发展类型理论分析

“点—轴”理论^[28]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29]等认为乡村地域系统具有地域性、动态性，不同区域差异巨大，且随时间发生演化和转型，呈现出散点分布（低效均衡发展）、极化发展、集聚发展以及城乡交互融合发展等不同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明显，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在同一时期呈现（图 2）。刘彦随提出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和极化发展战略，构建乡村振兴多级目标体系，从空间层面出发，科学识别乡村发展类型，从而确定乡村振兴极，并根据村庄发展条件与规模提出振兴对策^[2]。当前，乡村建设与振兴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乡村转型的主题之一，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中央五部委制定的《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的意见》中要求明确村庄分类，科学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特别是“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等按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对村庄进行分类^[30]。在结合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特征及乡村振兴要求分类施策的基础上，总结出村庄发展的五种类型模式，即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型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基础整治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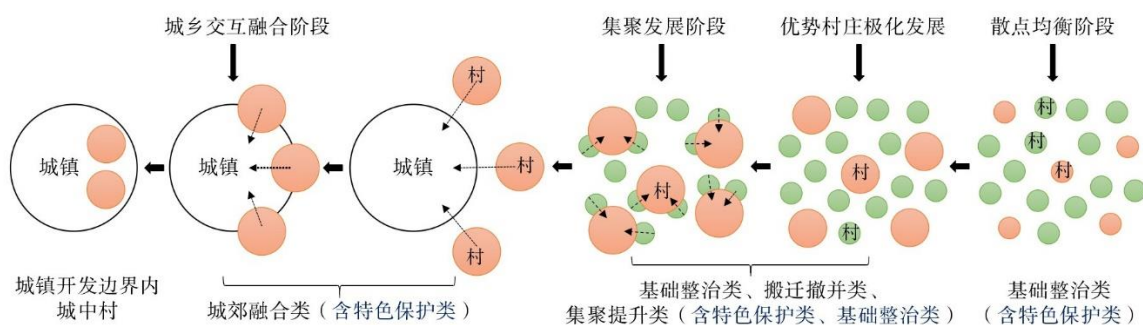


图2 村庄类型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关系

①集聚提升类村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业资源及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的村庄开始极化发展，该部分村庄对周边村庄的辐射带动和服务水平逐渐增强。随着节点村庄规模继续扩大，逐渐形成具有一定集聚规模的中心村与特色村。

②搬迁撤并类村庄。随着优势村庄极化与集聚发展，因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而造成人口大量流失需要统筹搬迁，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整体搬迁撤并的村庄。

③城郊融合类村庄。指位于城镇周边或城镇扩展区域，对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区域进行村庄规划。该类村庄通勤便利，城乡功能联系密切，可有效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但在管理属性上仍为农村。

④特色保护类村庄。该类型村庄存在乡村地域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散点均衡阶段村庄生产力水平低，因与城镇空间联系较少，保留了大量生态环境优美、特色资源丰富、具有较高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村庄；在乡村极化与集聚发展阶段，因部分特色村庄资源优势明显而迅速发展、集聚，进而形成乡域中特色节点型村庄；特色节点型村庄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因所处区位靠近城镇，或部分用地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开始进入城乡交互融合发展阶段。

⑤基础整治类村庄。该类型村庄生产力水平低，作为传统农业生产区域，村庄与城镇主要是生产、消费、社会之间的联系，基本处于散点均衡阶段。

2.2 识别思路与村庄发展类型确定

村庄规划作为乡村振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村庄发展类型识别是统筹县域（市域）范围内村庄规划的前提与基础。本文通过建立村庄发展类型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科学性、可获得性和易操作性的原则，通过是否列为各类保护名录、是否适合生存发展、是否位于城镇周边或发展方向上、是否具有发展优势等四个步骤，依次进行村庄类型初步划分。初步识别的村庄类型虽满足该类型村庄的划分标准，但村庄的发展往往受综合条件影响，而凤凰县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其综合条件较发达地区同类型村庄相对较弱，因此将结合基层乡镇领导干部反馈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现状发展潜力与限制因素进行再分析。基于各村庄发展潜力和限制发展分级评判，每个村庄分别对应一种发展潜力情形和一种限制发展情形，通过自由组合有九种形式，对村庄进行二次评价。结合初步分类与二次评价，最终确定村庄振兴发展类型为特色发展、保护整治、融合发展、城郊整治、提升带动、集聚整治、搬迁撤并、基础整治等8种（图3）。



图 3 村庄分类识别模型

2.3 村庄发展类型初判因子选取

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和研究区需求,将村庄类型初步分为特色保护、集聚提升、城郊融合、搬迁撤并、基础整治等五类,同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划分的标准^[30,31,32]提取划分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基础整治类是前四类无法划定的剩余村庄,因此不做具体指标划定。

2.4 村庄发展类型修正

村庄的发展潜力是村庄后续发展的基本动力,体现了各村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优劣情况,大多受人口、用地、经济、交通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限制发展因素是村庄建设发展的制约条件,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的安全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及村庄建设用地的选择。本文通过对村庄发展综合潜力与限制因素进行模糊评价来对村庄类型进行修正,以完善村庄类型的识别。

2.4.1 村庄发展潜力指标选取与赋值

本文选取现状人口、用地、经济、公共服务设施、交通等 5 个维度构建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其中人口要素评价人口集聚程度与村落空心化程度,用地要素主要评估国土开发强度,经济要素则选取村民年收入,公共服务设施分析其完善程度,交通要素则选取其各级道路覆盖范围。先根据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确定各维度指标权重,其次基于县域内各指标现状确定其区间值,①从人口数量上看,凤凰县超过六成(65.9%)的村庄户籍总人口数介于 1000~2000 人,三成(27.97%)左右的村庄总人口低于 1000 人,约 6%的村庄总人口超过 2000 人。因此人口集聚选取 0~1000 人、1000~2000 人、2000 人及以上 3 个等级。②王良健等在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测度中将流出人口比重[(户籍人口-居住本地且户口在本地人口数)/户籍人口]纳入综合测度指标,权重为 0.57,并根据测算结果将空心化程度分为改善、低增长、中高增长、高增长 4 种类型^[33]。本文村庄人口空心化程度指标亦采用流出人口比重 K,将区间分为四个等级,根据凤凰县人口流动情况,K 值为负数的村约 46 个,为人口空心改善型;K 值在 50%以上的约 36 个村,属于人口空心高增长;K 值为 25%~50%的中高增长型的村庄约 14 个,其余 165 个村 K 值为 0~25%。③一般而言,村庄人均建设用地最大值为 150m²/人,按村庄最大人口 2000 人计算,村庄建设用地最大约 30hm²。目前凤凰县只有 6 个村庄建设用地大于 30hm²,66.54%的村庄介于 10~20hm²,三成左右村庄建设用地小于 10hm²。通过计算凤凰县

国土开发强度（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村域面积比值 D），近七成村庄 D 值在 3% 以下，25% 的村庄 D 值介于 3%~5%，14 个村庄 D 值高于 5%，根据《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 年）》，2030 年全国国土开发强度控制在 4.62%。因此选取 0~3%、3%~5%、5% 以上 3 个区间值作为国土开发强度的等级。④经济指标（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凤凰县全域来看，村民人均年收入约为 5463 元，65.52% 的村庄村民人均年收入介于 4000~7000 元，在全县人均年收入上下浮动 1500 元左右，人均年收入高于 10000 元的村落仅 5 个，因此将经济因素分为 0~4000 元、4000~7000 元、7000~10000 元、10000 元以上 4 个等级。最后再根据李克特量表法进行区间赋值。将总分>75 的村庄划分为高潜力区，总分 60~75 的为中等潜力区，总分<60 的为低潜力区。

2.4.2 限制发展因子选取与赋值

本文从生态环境和灾害防治两方面进行限制发展分析，其中，生态环境采用生态红线面积/村域面积比值 S，将 $S \leq 80\%$ 的区域进行分级赋值；灾害防治采用灾害分区防治区划数据，具体从地质构造、地形坡度、海拔高程、水系发育情况及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进行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子和各要素的权值，利用 GIS 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数据空间叠加与统计。总得分越高则表示村庄受限制发展越严重。将得分>65 划分为高限制发展区，55~65 为中限制发展区，<55 为低限制发展区。

3 识别结果分析

3.1 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初判

①凤凰县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较为丰富，通过查阅相关保护名录，老洞村等 21 个入选前五批传统村落，椿木坪村等 2 个入选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村，永兴村等 3 个入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除去重复名单，共有 24 个特色保护类村庄。②凤凰县暂不涉及影响村庄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无影响村庄建设的重大自然灾害，虽存在部分滑坡区，但位于区域内的居民早已搬迁。因此本次仅从 B2、B3 两方面判定是否适合生存发展。通过 GIS 将生态红线与村界叠加、双评价中不适宜建设区与现状建设用地相叠加，初步筛选 12 个搬迁撤并类村庄。③城郊融合类识别包含 C1、C2、C3 三个指标，竿子坪镇与吉首市区相邻，因此将吉首市中心到各村距离纳入指标。由于城镇开发边界方案尚未确定，此次研究采用的城镇开发边界数据为模拟城镇开发边界数据（经过县国土部门及乡镇领导第一次修改数据）。由于吉首市中心对外的辐射力较凤凰城大，因此选取距离凤凰县中心 5km 以内、距离吉首市 10km 以内的村庄为距离城市中心近的村庄。综合以上，初步筛选出 30 个村庄为城郊融合类村庄。④集聚提升型村庄识别指标包含 J1、J2、J3、J4、J5、J6 等六个方面。具体为：由多个村合并而成，用地人口规模大，总人口 1500 人以上，建设用地在 10hm² 以上，人口密度为 2.2 以上的村；经济产业基础好，一产有优势或二三产较强，经济收入为年收入 5000 元以上的村；区位条件好，交通非常便利，满足国道 5km 或省道 3km 以内覆盖村域 60% 以上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村；国家省相关试点的村。综合以上，将满足 J6 或 J1~J5 中任意两项的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初步筛选出 113 个集聚提升类村庄。⑤剩余无保护需求、不接近城区、无撤并搬迁影响及搬迁意愿、无明显发展优势的村庄则列为基础整治类，初步筛选出 82 个村庄。根据上述分析，得到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的初步识别结果（图 4）。

3.2 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修正

3.2.1 综合发展潜力分析

凤凰县总体发展潜力低：①高潜力区 11 个村，主要位于城区及交通干道周围，受凤凰城区及吉首市区的辐射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特别是竿子坪镇部分靠近吉首市的村庄被划入为湘西经开区，对其经济发展有政策支持，同时高铁站的建设对周边村庄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②中潜力区 86 个村，主要集中于“人”字形国道、高速公路两侧，凤凰县无独立机场，高铁站还在建设当中，因此“人”字形国道、高速公路是凤凰县对内对外交通的重要部分，部分村庄会沿路形成集市等经济交易场所，会对周边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③低潜力区 164 个村，多位于西北部和南部交通较差区域，由于地形地势的影响，西北部和南部地区道路较少且路网盘曲，导致与周边区域的人口及经济流动较少，村庄发展较为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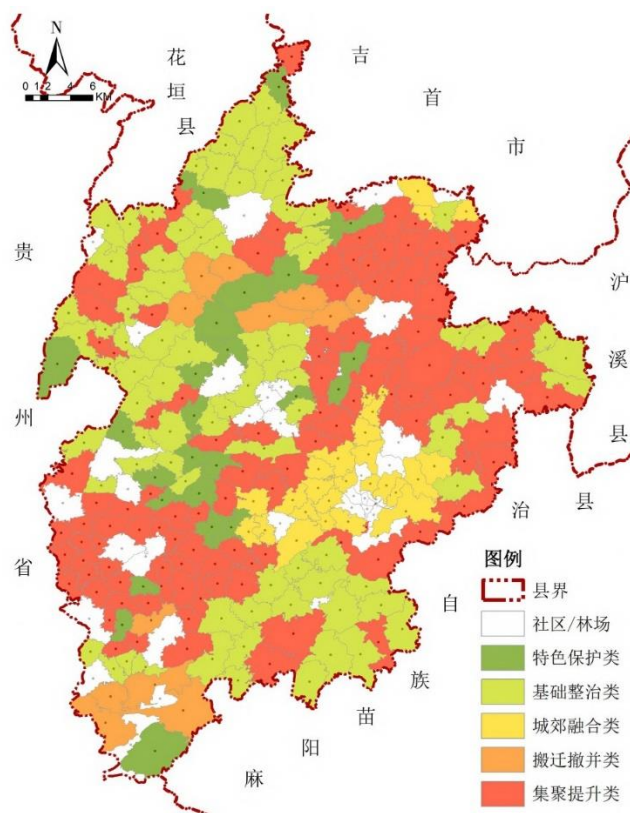


图 4 村庄发展类型初判结果

3.2.2 限制发展因素分析

凤凰县总体发展限制较低：①高限制区 23 个村，主要位于东部和南部，此区域灾害防治方面对居民生产、生活、安全有重要影响，凤凰古城周围由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也将其定为灾害重要防治区；②中限制区 44 个村，主要位于东南部边界区域，受生态保护红线制约，对村庄建设发展限制较大。③低限制区 194 个村，多位于中部地区，此区域的限制较少，有利于村庄后续建设发展。

3.3 综合情况判定

凤凰县全域属于低潜力低限制的村庄数量最多，达 113 个，占比 43.30%，其次为中潜力低限制的村庄 73 个，占 27.97%，高潜力中限制村庄为无。具体修正如下：①由于高限制发展区的发展局限性较大，将位于该区的铁桥村、万隆村等 11 个村由集聚提升类修正为集聚整治型村庄；塘坳村等 2 个特色保护类修正为保护整治型；杜田村等 2 个城郊融合类修正为城郊整治型。②属于低潜力中限制、中潜力中限制区，且乡镇诉求为基础整治类的村庄，尊重其村庄发展意愿，将坪里村、官寨村等 6 个村由集聚提升类修正为集聚整治型，高塘村等 6 个特色保护类修正为保护整治型。最终确定融合发展型 28 个、城郊整治型 2 个、提升带动型 96 个、集聚整治型 17 个、特色发展型 16 个、保护整治型 8 个、搬迁撤并型 12 个、基础整治型 82 个（图 5）。

4 规划重点与振兴策略

针对凤凰县“五类八型”村庄类型，结合自然环境特征和村庄发展现状，提出各类型村庄相应的规划重点和振兴措施，以期

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分步骤推动村庄发展与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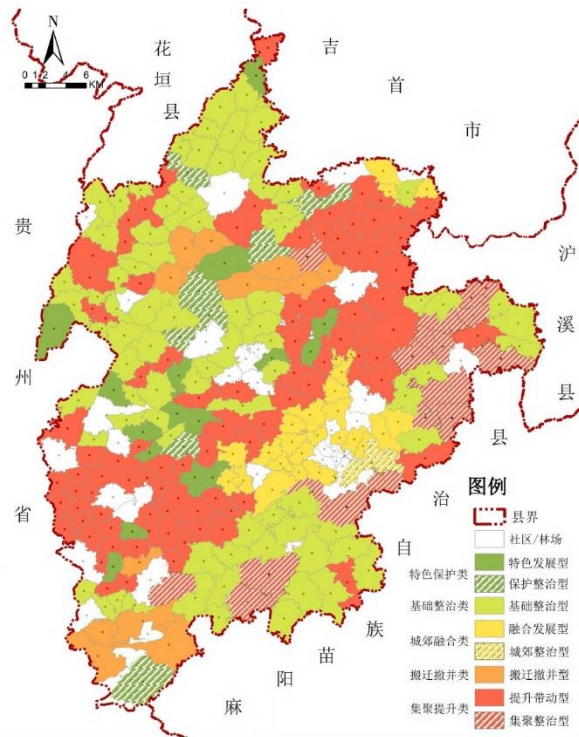


图 5 村庄发展类型修正结果

4.1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策略

①特色发展型村庄。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风景旅游、红色文化资源。在规划过程中应以历史文化保护、产业活化为重点，深入挖掘文化与特色要素，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增强特色保护和空间品质规划设计。凤凰县土家族、苗族文化底蕴丰富，还需注重少数民族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发展方面重点依托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文化旅游（如三江镇 2020 年评选为湖南省第二批特色文旅小镇），丰富乡村业态。②保护整治型村庄。该类型村庄虽因被评为传统村落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划入特色保护类，但其或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发展潜力较低；或因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如 50%以上用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需限制村庄大规模建设发展。规划应加强村庄生活、生产配套设施的完善，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加强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重点实施保护修复、土地综合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严格管控，落实产业准入条件。

4.2 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策略

①融合发展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应以统筹城乡基建布局和优化乡村用地结构为重点。综合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村庄自身发展需要，考虑承接城镇外溢功能的基础上，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利用并依托周边城区基础设施条件，以交通为纽带，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机制。②城郊整治型村庄。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减少村庄的盲目外扩，加大内部空间的整治力度，引导乡村就地城镇化。凤凰县城镇化水平较低，应紧跟城镇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找准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发展定位与方向，增强城乡间联系，推进城乡统一规划，尽量保持乡村特色景观，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

4.3 集聚提升类村庄振兴策略

①提升带动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对周边村庄有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应以产业振兴、人口回流、用地优化和环境整治为重点。在原有规模基础上通过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升村庄辐射带动与服务水平。实施“增减挂钩”政策，适度引导居民点集中建设，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补齐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促进农村土地高效利用；对耕地及园地面积占比大、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村庄，开展污染土地修复治理，引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工矿废弃地适度复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现整治常态化、长效化。②集聚整治型村庄。该类村庄虽具有一定产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或因重大项目建设，或因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整体发展受限。凤凰县乡村经济收入水平和发展条件普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山地较多，适宜建设的区域较少，对较为偏远、自然灾害频发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搬迁村庄（居民点）进行拆除，保留或扩大村庄集中居住点，通过公共服务提升来形成新的中心点。

4.4 撤并搬迁类村庄振兴策略

该类型村庄应以建设管控为重点。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等建设行为，重点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进行危房改造、安全防灾、道路整治等可能危害居民安全方面的整治，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因此对该类村庄应科学选址居民安置点，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村民基本的建房需求与生产生活功能。

4.5 基础整治类村庄振兴策略

该类型村庄重点在于完善基础建设和满足村民建房需求。维持原有的乡村风貌，对村内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开展整治和完善工作，确保村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由于基础整治类村庄基本没有较为突出的发展条件及特色，因此在考虑村庄建设用地布局的时候应尽量将建设用地集中布置，集中布置的方向考虑结合周边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村庄共同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作为统筹县域（市域）范围内村庄规划的前提与基础，对后续村庄发展与振兴有着重要影响，欠发达地区村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为更好地精准扶贫，尤为需要科学把握村庄发展类型。本文通过构建村庄发展类型初步识别与修正模型，以湘西地区凤凰县为例，对 261 个村庄进行类型识别，识别结果符合当地实际。结果表明：①村庄类型可分为五类八型。②凤凰县县域层面以集聚提升类与基础整治类村庄为主，占比 75.48%；同时全域以低发展潜力低限制、中等发展潜力低限制型村庄为主，占比 71.27%。整体发展潜力较低使得基础整治类村庄占比增大，集聚提升类村庄虽占比大，但集中在国道、省道等交通干道附近呈片区式分布。③针对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结合湘西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和村庄发展现状，提出各类村庄相应的规划重点和振兴措施：特色保护类村庄应以历史文化保护和产业活化为重点；集聚提升类村庄应以产业振兴、人口回流、用地优化和环境整治为重点；城郊融合类村庄应以统筹城乡基建布局和优化乡村用地结构为重点；搬迁撤并类村庄以建设管控为重点；基础整治类村庄应以完善基础建设和满足村民建房需求为重点。

5.2 讨论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城乡发展潜力和限制因素也存在差异。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它们普遍地理区位差，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技术和人才严重匮乏，观念陈旧保守，竞争意识不强。鉴于村庄发展现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在具体识别时仍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类型和赋值的调整。作为湖南省精准扶贫典型代表，凤凰县扶贫初见成效，但也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空间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产

业结构还需优化等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要跳脱出传统乡镇为单元的村庄布局规划思维,从县域层面落实村庄分类和布局,确定各村庄类型、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可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引导人口向乡镇所在地、产业发展向集聚区集中,引导设施优先向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村庄配置。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指标不一定对所有地区适用,未来可以增加其他区域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村庄分类方法,推动村庄规划转型,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强调从空间层面科学识别乡村类型,从而寻找乡村振兴极^[2],以点带面,促进城乡融合。欠发达地区是一种区域的概念,空间发展不平衡,更应从区域空间角度出发,以县域、镇域、乡域等各级经济中心为源,依托线状基础设施,引导人口、产业向区域增长极集聚,使不同强度的经济中心沿交通线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通过不同地域之间资源要素的跳跃式配置,加速近期重点发展村庄逐级传递扩散,根据村庄类型进行精准扶持发展,形成特色村、重点村和中心村、一般村,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县域层面村庄类型的科学识别是乡村发展的第一步,欠发达地区精准脱贫,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区域角度重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从区域角度构建城乡治理体系,从区域范围内探讨空间功能嵌套及空间调整和产业配套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Li Yurui,Fan Pengcan,Liu Yansui.What makes better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 Evidence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ypical villages[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9,83:111-124.
- [2]刘彦随.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
- [3]刘彦随,严轭,王艳飞.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J].经济地理,2016,36(7):1-8.
- [4]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19-26,152.
- [5]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 [6]刘彦随,李进涛.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J].地理学报,2017,72(1):161-173.
- [7]刘彦随,周扬,刘继来.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3):269-278.
- [8]Johnson T G.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finance:Key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71(5):1324-1326.
- [9]Kawate T.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form of rur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rural Japan[J].Journal of Rural Problems,2005,40(4):393-402.
- [10]Bai Xuemei,Shi Peijun,Liu Yansui.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J].Nature,2014,509:158-160.
- [11]李高峰,郝润梅,吴晓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规划编制类型划分[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0(3):1-10.
- [12]郭晓鸣,张克俊,虞洪,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J].农村经济,2018(1):11-20.
- [13]文琦,郑殿元.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地理研究,2019,38(3):509-521.

-
- [14] 乔陆印.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1340-1348.
- [15] 李裕瑞, 卜长利, 曹智, 等.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与实证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2):243-256.
- [16] 杨秀, 余龄敏, 赵秀峰,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潜力评估、分类与规划引导[J]. 规划师, 2019, 35(19):62-67.
- [17] 罗怡.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村庄发展评价及建设规划分类研究[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 [18] 史秋洁, 刘涛, 曹广忠. 面向规划建设的村庄分类指标体系研究[J]. 人文地理, 2017, 32(6):121-128.
- [19] 崔明, 覃志豪, 唐冲, 等. 我国新农村建设类型划分与模式研究[J]. 城市规划, 2006(12):27-32.
- [20] 朱彬, 马晓冬.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J]. 人文地理, 2011, 26(4):66-72.
- [21] 单勇兵, 马晓冬, 仇方道. 苏中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J]. 地理科学, 2012, 32(11):1340-1347.
- [22] 璩路路, 李裕瑞, 李琳娜, 等. 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发展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10):153-161.
- [23] 李义龙, 廖和平, 李涛, 等. 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 以重庆市渝北区 138 个行政村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8, 40(8):56-66.
- [24] 孟欢欢, 李同昇, 于正松, 等.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2):144-148.
- [25] 周华, 王炳君. 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9):48-55.
- [26] 王艳飞, 刘彦随, 李玉恒, 等.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5):135-142.
- [27] 郭艳军, 刘彦随, 李裕瑞. 农村内生式发展机理与实证分析: 以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2, 32(9):114-125.
- [28] 陆大道. 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02, 22(1):1-6.
- [29]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 经济地理, 1991, 11(3):1-6.
- [3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N]. 人民日报, 2018-09-27(01).
- [31] 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R]. 2019-01-04.
- [32] 湘自然资办. 关于加快做好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工作的通知[R]. 2019-11-06.
- [33] 王良健, 陈坤秋, 李宁慧.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J]. 人口学刊, 2017, 39(5):14-24.